



一代英豪

建党初期的蒙古族共产党员

主编：乌嫩齐

编者：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
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

民族出版社

序

云照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陷入了饥寒交迫和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境地。在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里，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着救国拯民的道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苦难的蒙古民族，他们放弃了经商仕途，割舍了亲情，自发走上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道路，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并成为领导内蒙古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李大钊同志对他们寄寓了极大的希望。这期间，他给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学生以教育和引导，称他们是“新生力量，革命的财富”。

早在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照耀中国人民革命征程的灯塔。



内蒙古革命的历程是曲折的，悲壮的。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把满腔热血洒在了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本书所褒扬的十位英豪中，有牺牲于大革命时期的蒙古族共产主义先驱者多松年、李裕智，有威震大青山、驰骋土默川的抗日英雄贾力更、高凤英。蒙古族优秀革命青年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工作中的骨干多松年烈士，1927 年在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以后，不幸在张家口被捕。敌人曾以高官厚禄诱降，又施以皮鞭抽、棍棒打、铁条烙等酷刑，他始终双唇紧闭，只字不吐，最后，敌人用五根一尺长的大铁钉，将他活活钉死在张家口大境门城墙上。革命者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献身，他们用鲜血浇灌了革命种子，唤醒了众多的各族群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

在那觉醒和奋激的年代，在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蒙古族早期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铸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篇章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他们灿若星河，浩然于宇，无愧为时代的英豪。

最屈辱最悲壮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造就了革命最彻底、战斗最英勇的一代。他们是 20 世纪的英杰，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们那可贵可敬的高尚人格留给后人留给 21 世纪的是长驻天地之间的无字无形的心碑，巍巍而立，折不了，毁不掉，永放光芒。他们所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一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缩影和象征。

1982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与党心、军心、民心共鸣的铿锵声音：“对党的老干部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不会忘记，也决不应忘记的”。江泽民总书记 1991 年 9 月 21 日在西柏坡曾说：“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本书编写的十位



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的英雄业绩，也将永远为内蒙古各族人民所铭记。

回眸世纪风云，以深沉的历史感揭示一代英豪的情怀、风范、境界，并以此诉之来世，激励后人，这就是《一代英豪》这本书鲜明的时代特色。2001年7月1日，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历史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其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编著《一代英豪》出版，也是向这一伟大节日献礼。

《一代英豪》这本书是严格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著的。史料准确，事迹感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特别是将先烈们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附录在后，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文如其人的文章，重现在读者面前，更为本书增添了真实性和历史价值，作为那段历史的存照，这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愿一代英豪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目 录

序/云照光/1

- 长城之魂
——中共五大代表多松年/1
- 喋血毛乌素
——大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军创建者李裕智/33
- 北国雄鹰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荣耀先/47
- 青山骄子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期学员贾力更/63
- 青山英烈
——抗日民族英雄高凤英/79
- 革命生涯六十年
——内蒙古政协主席奎璧/91
- 塞原播火人
——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108
- 人民的儿子
——1927 年入党的李森/131

- **傲骨铮铮**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期学员高布泽博/154
- **廉洁的典范**
——全国模范公安厅长毕力格巴图尔/165

附 录

- ◎ 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 吉雅泰/179
- ◎ 内蒙古革命史上的几个问题 吉雅泰/186
- ◎ 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 任晋贞等/198
- ◎ 豁出去搞革命 李森/202
- ◎ 李森同志逝世一周年祭(诗六首) 美光/229
- ◎ 第一次考验 毕力格巴图尔/231
- ◎ 平绥路地下 毕力格巴图尔/244
- ◎ 李葆华同志致张家口市大境门小学
“多松年中队”的一封信 李葆华/261
- ◎ 一代英豪的摇篮
——北京蒙藏学校简介 乌敬齐/262
- ◎ 土默特学校简介 陈贵敏/268
- ◎ 后记 /281

长城之魂

——中共五大代表多松年

蒙古族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多松年同志，是内蒙古土默特旗人，中国革命的突出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



1923年，多松年同志考进北平蒙藏学校不久，就由邓中夏和赵世炎同志介绍，加入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党组织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少数民族的解放和斗争问题。

一个寒星闪耀的秋夜，多松年和另外两个蒙古族同学从西单走到宣武门，不声不响地进入一座古庙里。月光下，隐约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殿，四周长满了荒草，

人迹罕至。

和多松年一起走进来的同学，一个叫佛鼎，一个叫赵诚，三个人围着一盏小煤油灯坐下来一看，那里已经坐着好几个年青人了。他们举起了双手，微微地笑着，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时，走过来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戴着近视镜的中年人，十分高兴地同他们三个人一一握手，又递给每人一本小书。此时此刻，破败的古庙里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同志间的温暖。他们三个人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小书，封面上写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下面印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头像。

那位四十岁左右的同志，正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会议开始了，李大钊同志用异常朴实亲切的语调开始了讲话。他从苏联讲到中国，讲得那样清晰易懂，简明生动，讲得人人心里亮堂堂的，充满了革命的信心和力量。多松年同志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副慈祥的面容，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对这位老师涌起了无限的敬意。

会后，李大钊同志把他们三个蒙古族同学留下来，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咱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想推翻这些压迫势力和剥削者，需要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行，单靠一个汉族是不行的。蒙古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从历史上看，为我们祖国作出过很多贡献。现在，蒙古族人民受着特别深重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大。所以，蒙古族人民在革命事业中一定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还需做大量的宣传、动员、组织、领导工作，你们应当肩负起这个重任，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

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深深地刻在多松年和同学们的脑海里。

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经常开展活动。活动地点不固定，活动时



间也是临时通知，但多松年同志每次都积极参加，从不缺席。他认真地学习完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马列著作，还认真地阅读着每期的《响导》周报和《新青年》。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心。当认定了共产主义道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之后，他就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

1924年秋末的一个夜晚，多松年同志跟在赵世炎同志的后面，踏着淡淡的星光来到了宣武门，两个人先后闪进了那座古庙。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正坐在香案旁，在小煤油灯下低声交谈。赵世炎和多松年坐到对面的椅子上，闲谈了几句之后，李大钊同志很严肃地说：“多松年同志，根据你的申请以及赵世炎和邓中夏同志的介绍，我们决定吸收你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今后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邓中夏和赵世炎同志上前紧紧握住多松年的手，多松年激动的热泪点点滴滴地掉在了香案上。

多松年同志擦了擦眼泪，兴奋异常地说：“请党放心，为了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早一天得到解放，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我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动摇，革命到底！”洪亮庄严的声音，在这座古庙里久久回荡。

李大钊同志随后站起来，在香案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个镰刀斧头，代表党旗，接着就举起了拳头，领着多松年进行了严肃的入党宣誓。之后，赵世炎同志又简要地讲了一遍党的性质和纲领及党员义务和权利等问题。邓中夏同志再次鼓励多松年同志好好学习，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要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入党以后，多松年同志担任了北京市西城区党的宣传委员。任务就是通过宣传的方式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多松年同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都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



了。不会画画，就刻苦地练画；不善于讲话，就努力提高表达能力；写不好字，就勤奋地练习；不会刻印传单，就耐心地学习。经过努力他很快地学会了这一切，成了一名成熟的宣传工作者。他甚至改变了自己憨厚腼腆的性格，登上了舞台，大大方方当起了演员，运用文艺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国共合作以后，工农革命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11月，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很短时期内，各省市纷纷响应，各地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初，段祺瑞亲手操纵的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善后会议”召开了。与此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也随后在北京召开了。孙中山和李大钊亲自主持了这个大会，各省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吉雅泰、奎璧、赵诚等同志都以绥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多松年同志负责会议的宣传工作。

段祺瑞恼羞成怒，动用大批走狗爪牙和巡警，跑上街头镇压革命人民。多松年和他的伙伴们毫不畏惧，坚持在北京的各个街头小巷搞宣传活动，同反动派进行着勇敢机智的面对面的斗争。

那些日子，不管是大街上，还是小巷里，几乎每天都出现些醒目的标语和口号：“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愚蠢的军警们日夜巡查，却抓不住贴标语和口号的人，天天都挨着上司的臭骂。

这天，在珠市口闹市上，多松年打扮成一个商行的店员，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他夹着一卷标语，外面裹着几张商店的广告，见四周没有人注意他，便停在一个橱窗旁，掏出一个小浆糊瓶，抽出一张标语，迅速地将抹好浆糊的标语贴到墙上。随后，他转过身若无其事地抬腿就走。正在这时，突然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巡警，正趾高气扬地朝他这里走来。怎么办？从距离上判断，扭头逃走已来不及了。他脑子一转有了主意，马上显出一副笑容可



多松年（左）与李裕智二十世纪于北京

掬的样子，迎面朝巡警走去。

刚走了几步，巡警就厉声问道：“你往墙上贴什么？是不是贴共产党的标语？”

多松年走到巡警面前，从腋下抽出一张广告递给他说道：“老兄发财，请看生意广告！”

巡警远远地扫视了一下贴标语的地方，那里已经围了些人正在观看，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收回目光，打量了一下多松年，训斥道：“共产党正在搞赤化宣传，再不准随便贴广告！如果再贴把你抓起来问罪！”

多松年笑着说道：“好，不贴了，剩下的广告都给你们看去吧！”说完，把那一卷标语塞到巡警手里，便立即钻进行人中去了。

当天晚上，多松年同志回到蒙藏学校，正赶上邓中夏同志来

检查工作。听完多松年的汇报之后，一方面表扬了他机智勇敢的精神，一面提醒他们进一步提高警惕性，不可冒险粗心。然后问：“你们的文件和传单放在什么地方？”

多松年掀开自己的枕头和被褥说：“都在这里放着，保险的，我们的被褥破乱他们不会翻腾的。”

邓中夏指出：“敌人为了抓我们什么也不管，这样很不安全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在别人不易发现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邓中夏同志又来了，一进门就问：“文件和传单转移到哪里去了？”

多松年笑着说：“这回可保险了，就在这屋里，谁都难以找到……”

邓中夏同志上上下下一看，忽然停下来说：“是不是在天棚里呀？”

“啊，你怎么知道的？”

邓中夏指着天棚上补糊的一块纸问他：“那张纸是你们新糊上去的吧？”

多松年同志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邓中夏严肃地说道：“多松年同志，这两次都是李大钊同志让我来的。他的工作忙得很，但他的心里时时刻刻都惦记着你们。他估计军警这几天要加紧抓人，所以要我们格外当心。他知道你们热情高，有胆量，有智慧，但是越这样越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他特别强调指出，你们是内蒙古的革命火种，党把内蒙古解放的期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接着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们不大去的地方？”

突然有人插了一句：“后花园杂草长得乱蓬蓬的，听人们说，那里过去是军阀处杀人的地方，人们都害怕，躲着它。”

邓中夏同志说：“好，咱们看看去。”

随后，他们一起到后花园里找到了一个多年不用的地窖，里

边有一堆破花盆。他们便把文件和传单用花盆扣好，藏在了地窖里。

几天以后，果然来了十几个军警和特务，在蒙藏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到处搜查。可是，里里外外搜查了个底朝天，仍然一无所获，只好沮丧地离去。

李大钊同志的关怀，邓中夏同志的帮助，深深地教育着多松年，从那以后，他时时刻刻牢记教导，一切行动更加慎重警惕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蒙古族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多松年同志接受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负责创办《蒙古农民》。通过办刊物可以更加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打击反动派，教育人民起来革命。

多松年同志接到任务之后，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决定离开北平，回到蒙古族群众聚居的察哈尔和绥远及内蒙古一带进行社会调查，宣传革命。

火车在群山中奔驰。多松年同志一幕幕地过着电影。他不断地回忆着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的教导，反反复复地考虑着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想，办《蒙古农民》的宗旨应当是：真正反映蒙古族聚居地区广大农牧民的苦难生活，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及地主王爷们对各族人民的奴役欺凌，从而启发广大群众的觉悟，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

临行前，他搜集了《响导》和《新青年》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刊物，其中有铅印的和油印的，有公开的，还有内部的。特别把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同志的指示又熟记了一番。

火车在京绥线上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多松年同志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蒙古农民》应当办成什么样的刊物呢？按照党组织和李大钊同志的旨意，当然首先要有理论，但稿件要尽量写得通

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通讯、报道、社会调查……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版面要严谨，也要活泼。根据少数民族读者的需要，应当用蒙汉两种文字出版。用油印而不用铅印，油印灵活方便。多松年同志还想到，稿子可以找些同志来写，刻印自己动手。自己的字写得不漂亮，但能够做到清晰工整，让群众看得清看得懂。

火车到了张家口。他下了车，便去找张家口地委，由地委同志带他到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经过引见，他还深入到造纸厂、电灯公司、农村牧区、蒙古包放牧点，以及一些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张家口刚刚举行过声援“五卅”运动的大示威。工人、学生、农牧民，反帝热情高昂，不少工人和学生赴农村牧区开展宣传活动。多松年同志也越过万泉山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和牧区的浩特，进行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户，又从这个浩特到那个蒙古包。白天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小油灯下整理笔记。几天功夫，就已经记满了几大本子。

那时候，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内蒙和热察绥地区正在拉锯战的中间地段，蒙汉人民饱受蹂躏。不论哪个派系的军阀到来，都要强行征调军马、军粮、军草、军需，所过之处抢夺一空。群众一听到兵匪来临，马上带上妇女小孩逃难。归来之后，家室尽成废墟，凄惨之状，难以形容。尤其是蒙古族人民群众，更是惨遭压迫，牧场被开垦掠夺，牲畜被抢光，蒙古包被撕坏，家家户户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天，多松年同志来到一个蒙古族聚居的浩特，看到一些蒙古包东倒西歪，有一些男女牧民裹着破旧的羊皮坐在牛羊圈里。牛羊圈里看不见多少牛羊，有几条骨架子狗乱跳乱叫。他看到这一片凄凉景象，不由得掉下眼泪。他走到一座四角随风飘扬的破旧的小蒙古包前停下来，叫了几声门，一位蒙古袍褴褛的老人掀



开草帘子爬了出来，打量了多松年一阵子，把他让进包里去。包里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一家老小衣不蔽体，有的围着毡片，有的裹着破羊皮，全都围坐在牛粪火炉前取暖，一个幼小的孩子饿得又哭又叫。

看到这种情景，多松年感到更加心酸，竟哭出了声来。他擦了擦眼泪，用蒙古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便坐到炉火边亲切地和他们攀谈起来。老阿奶看多松年不是坏人，就向他哭诉了牧民们的遭遇。多松年同志从自己带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给了老阿奶。她们全家人感激得举起双手不断地上下摆动，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从草原上回到宝昌城里，又跟旗县农民联庄会的人谈了不少次。听他们讲，很多地方的农牧民已经自动组织起来了，十几人一伙，几十人一帮，反对王公，打击土豪，抗拒捐税，抗清仗局。听到城里有事的消息后，他们就会自己带上干粮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斗争。有一个县太爷太坏，学生和农牧民联合起来，砸了他的公馆，抄了他的家，把二堂夫人的红绫缎被和绣花枕头都扔进了猪圈里。

多松年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写出了一篇篇富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多松年便乘火车西行，到了自己的家乡归绥城。塞外古城充满活力，以吉雅泰同志为首的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领导这里的学生、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

多松年和吉雅泰等同志交谈后，不但从这里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而且更加深了对办《蒙古农民》重要性的认识。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蒙古农民》第一期印出来了。当他把一份内容深刻、版面整洁、字迹清晰的《蒙古农民》刊物送到李大钊面前时，李大钊同志惊喜地说：“好啊，同志，真想

不到，你在这短短的时间，能搞出这么好的刊物，实在是辛苦了。”

邓中夏和赵世炎同志仔细看过《蒙古农民》创刊号之后，对多松年说：“不错，不错，有理论，有事实，内容充实，战斗性很强。”接着就指着几篇文章说：“这几篇很有号召力，标题也特别醒目；这几篇简直是高射炮，这几篇是机关枪！就这样办下去。下期，可以再增加些新的内容，比如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啊，国内各地斗争简讯啊，还要突出一下对大汉族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印数也要逐渐增加。”他们还告诉多松年可以找哪些同志写稿子，找谁帮助编稿排印等等。李大钊同志又插话说：“党组织已把《蒙古农民》作为党的内部发行刊物了，我们要通过它直接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广大各族民众起来革命和斗争。”

从此，《蒙古农民》随同《响导》、《新青年》、《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全国各地。它在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汉族群群众中影响特别大。

《蒙古农民》在各族人民中，特别是在蒙古族农牧民中起到了很大的鼓动激励作用。虽然它只出版发行了几期，但它的伟大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永远值得人们回忆和纪念。

蒙藏学校原来的校长思想比较开通。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他从不过问干涉。后来，军阀和政府发现蒙藏学校的学生越来越不“安分守己”，就指令蒙藏院负责“严加整顿”。于是，蒙藏院就撤了老校长，换了一个新校长，名叫金永昌。这个人一来，就制定了一套清规戒律，严格限制学生的自由活动。全校学生都感到不能忍受，群起而攻之，不到一个月就把新校长赶出了校门。随后又换了一个叫王维汉的校长，这个家伙不但反动，而且还很阴险。他组织了一些反动的军警住进学校监视学生的活动。地下党